

從系統理念看家庭與小學輔導

陸方鈺儀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輔導與學習支援系

本文以「人在環境」的系統理念為中心，探討家庭與小學輔導的關係。文章首先闡釋學生成長與學校系統、家庭系統、本港及全球環境的關連，並嘗試提供一個理念架構，繼而介紹基本的家庭治療理念和技巧，及其於學校輔導中的運用，以供小學輔導人員和教師參考。筆者最後更指出，小學輔導的成效有賴家庭系統及學校系統的互相配合。

「以輔導理論來說，我想最好不要假設動機是由個人而起；反之，我們要把人看作社會環境的一部分。」

“For a theory of therapy, I think it is best not to assume that motivation comes from within the individual, but to look instead at the individual as part of the social systems.”

(Haley, 1987)

家庭因素對學生的健全成長起關鍵性的作用。自九零年代起，本港學校也積極推廣家校合作。但這些工作很少顧及本港的家庭特色，以及在劇變中的家庭趨勢和學生個人成長的關係。本文一方面填補這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更提出系統理念在小學輔導的重要性，特別指出：要明白學生，也要理解他們所處的家庭系統、本港環境

以至全球環境，是怎樣互有關連並影響學生的個人成長。本文嘗試以「人在家庭」的家庭系統觀點去理解家庭與小學輔導的關係，並介紹國際文獻對於家庭治療的系統理念與技巧如何運用於學校輔導的論述，以供小學輔導人員和教師作參考，最後更提出要小學輔導有效，學校系統與家庭系統必須互相配合。

家庭與學生成長的關係

很多研究不斷指出：家庭動力是影響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和行為適應的主要因素。Olson (1984) 及 Portes, Franke, & Alsop (1984) 均指出：小學階段的兒童的學習成就與親子關係有相關作用。不少有關中學生的研究也有同樣的發現。Forehand, Long, Brody, & Fauber (1986) 發現學生的平均分數與親子衝突和母親抑鬱指數成反比例。Dombusch, Ritter, Leiderman, Roberts, & Fraleigh (1987) 的研究指出民主型的親子模式與中學生的學術成就有正相關，而獨裁型與放任型的親子模式都與學業成績成負相關。Nicoll (1984)、Rutter (1985)、Steinberg & Elmen (1986) 及 Schiamberg & Chin (1987) 發現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與家庭系統的情感、溝通和權力都有關係。Good & Brophy (1986) 有關學生成就的研究，指出家庭因素比學校因素更能影響學生學業成就。在本港，Lau (1995) 同樣發現家庭關係是影響青少年發展和造成偏差行為的主要因素。石丹理、陳麗君 (1998) 也發現家庭因素，如家庭氣氛、親子關係和溝通，與青少年心理病徵、應付資源、學校行為和藥物濫用都有關係。石丹理 (Shek, 2002) 隨後更指出家庭功能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顯著相關。而家庭功能與青少年的適應亦有很大的關連，尤其對於處經濟弱勢的青少年為甚。馬和民 (1990) 的研究同樣指出家庭環境的客觀變量 (如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長受教育程度、家庭所提供的教育資源、家庭規模、出生次序等) 和家庭主觀變量 (如家長期望、家長教養方式、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的積極性、家庭的情感氣氛、家庭對話的質量等) 都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其中，石丹理 (Shek, 1999a,

1999b, 2000) 的追蹤研究突破性指出父親的質素可能比母親的質素更能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這方面可能反映中國傳統文化以「嚴父」為「一家之主」有關。另一方面，母親的質素對女孩的影響較對男孩為大，這與中國文化中女兒比較順服和「黏家」等不無關係。於此可見，討論香港的家庭特質不能離開中國人的文化。這些研究都指出，要輔導學生成長，必須顧及學生的家庭。

本港家庭趨勢與特色

家庭作為一個提供經濟、關係（情緒支援）和養育孩童的基本單位，似乎受到了現代化很大的衝擊。這是世界性的趨勢，本港家庭亦深受影響。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增加，至2001年，本港已婚女性有48.9%在職（香港政府統計署，2002a，頁131）。很多婦女在結婚生育後仍繼續工作，雙職家庭變得相當普遍。有部分家庭聘用外籍家庭傭工來幫助照顧孩子和料理家務。據香港政府統計署（2002b，頁35）的估計，香港約有197,005位家傭，分別來自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等地。另一模式是孩子日間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顧，晚上由父母自己照顧。還有「周末家庭」的現象，即是星期一至五孩子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顧，並住在他們家中，周末才回到自己父母的家居。本港學者李明堃（Lee, 2000）更指出本港家庭雖以核心家庭為主，但傳統的家庭觀念與姻親之間的互相支援亦很普遍，他稱之為「復原家庭主義」（Resilient Familism）。傳統的家庭觀念如：家庭應該是「恆常不變」、「家醜不出外傳」（Law et al., 1995）仍被強調。而祖父母甚至姨媽姑姑等延展家庭成員照顧子女亦相當普遍。

本港的離婚數字在過去數年不斷攀升，由1996年的9,473宗至2002年的12,943宗，增加36.6%；1996年每100對新人結婚，同時有26.8對夫妻離異，但到了2002年卻有40.4對夫妻離異，升幅近一倍（《文匯報》，2004）。雖然離婚率仍然大約為百分之零點三，遠低於歐美國家，但在亞洲卻是第三高。單親家庭相應增加。2001

年有58,460個單親家庭（與十八歲以下子女同住），其中有45,072個由母親照顧，13,388個則由父親照顧。以母親為戶主的單親家庭多數比較貧窮。再者，這些資料顯示，大部分單親父母年齡在30至49歲之間，所以重婚與同居的可能性很大。重婚家庭背景複雜，孩子容易遇到適應上的困難。與此同時，家庭暴力的數字也不斷增加，由2000年的1,072宗增至2002年的1,665宗；兒童遭性虐待個案於2002年全年有179宗，而在2003年首半年已有73宗（《東方日報》，2004）。研究顯示無論學術成績或在校行為上，雙親家庭裏成長的學生比在單親、或在母親和後父的家庭裏成長的學童適應得較佳（Zill, 1996）。

現代香港家庭所面對的衝擊

香港的家庭深受本港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香港常被稱為中西文化的交匯點，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在經濟（如金融）和制度（如教育和法律）上都很先進，能與西方先進國家接軌，但文化上依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造成混合情況。在香港這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裏，家庭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組織（馬麗莊，2001）。Law et al.（1995）的研究更指出香港家庭的「感情投入」和「凝聚力」非常強，是中國文化的延續。近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公佈的本港家庭團結指數大幅倒退，2002年只得負152，較2000年的負74，倒退超過一倍。社聯社會專責委員會主席石丹理更表示，新婚率低、離婚率高及持續偏高的家庭暴力是影響凝聚力的主要因素，情況值得關注（《文匯報》，2004）。

在親子關係方面，陸方鈺儀（Luk-Fong, 2005）對小學生的研究顯示傳統的中國思想與父母的權威，與現代的觀念如平等、溝通等，有時共存但有時互相衝突，常令父母與子女相處時不知所措，尤其是在管教子女方面（參看Luk-Fong, 2005）。這與石丹理（1999）以青少年為對象的兩代關係相衝與相融的研究結果很相似。石的研究顯示兩代都同意尊敬和孝順父母這基本概念，但兩代對權威、個人

私隱、交友自由和家長表現卻有很不同的詮釋。學生在學校得到較多平等與自由的理念，但很多草根家庭仍然很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男尊女卑」等觀念仍很重要。再者，兩代與兩性之間對於男女平權的看法也有顯著分別（羅秉祥，1993）。社會學家Giddens（2001）所指的家庭「為傳統與現代衝突的地方」，在中西文化交匯的香港更得到驗證。這正與香港有三成半的父母感覺不懂得教導小二至中四的子女（《明報》，2000）和有六成學生夜歸，感到「在家沉悶」、「父母囉嗦」的研究數字不謀而合（《明報》，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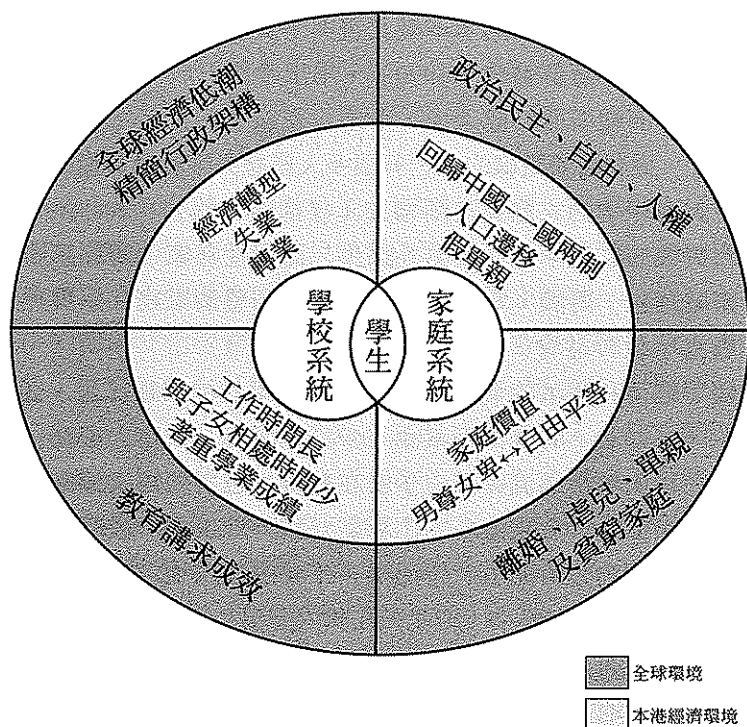
其次，隨著經濟轉型和雙職家庭湧現，父母親與子女相處的時間相應減少。調查數字顯示本港父親與子女相處的時間每天不超過四分鐘（香港小童群益會，1990）。早出晚歸已成一般的現象，很多機構因經濟轉型而精簡架構，令不少在職者的工時增至每日十二小時以上，更有身兼數職的。也有很多人經歷失業和負資產的壓力，生活在貧窮線下的家庭更不斷增加（《都市日報》，2003）。在部分父親失業的家庭中，女性出外謀生，而男性在家中處理家務，形成「家庭角色」對調，令身為男性的父親和整個家庭都感覺難於適應（香港小童群益會，2003）。

隨著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兩地分隔的家庭越來越普遍。從90年代開始，「九七」的政治因素令不少家庭成為「太空人家庭」。部分家庭在移民潮後回流香港，子女在教育上也需再次適應。因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愈來愈多的工種需要到外地工作一段時間。另一方面，隨著國內經濟開放，香港很多工業遷往內地，因為工作往還而出現的「包二奶家庭」（即丈夫在國內有另一妻子）亦有所增加。九七回歸後，有更多「新來港人士」家庭的出現，就入境數字說，每天自中國內地持單程證到港定居的名額有150人。無論是「太空人家庭」、「包二奶家庭」還是「新來港家庭」，很多時都有「假單親」的情況出現，即父或母有較長時間不與家庭一起。陸方鈺儀（Luk-Fong, 2005）對小學生的親子關係研究顯示，小學生最渴望的親子關係，是父母能有更多時間陪伴他們。可惜的是，該研究中校方受訪的成年人中（包括校長、家長和老師），只有一名老師強調學生這

方面的訴求。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已經很少，而華人家長對學業成績的重視和望子成龍的心態，加上過分強調學業成績的教育制度，以致那極少又寶貴的親子相處時間，也用於功課上的追討和爭拗，令父母子女雙方面都感到莫大的壓力。

以上的討論嘗試帶出學生的成長深受家庭和學校兩個主要系統所影響，並以家庭的影響至為深遠。而家庭相應受到本港的社會環境及全球性的整體發展（見圖一）。

圖一 學生成長與學校系統、家庭系統、本港及全球環境的關連



殖民統治與全球化帶來西方的社會機制（如教育、法律、金融等）和價值觀（如民主、自由、人權等），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或教育方面，對於本土的中國文化與價值觀都帶來衝擊；有時帶來混雜，有時帶來混亂。一些傳統的中國文化也逐漸瓦解。

系統理念與學校輔導

根據系統理論的鼻祖Ludwig Von Bertalanffy (1956) 所言，系統理念是：「不同物體的整體及它們之間的互動。」Baker (1969) 更說出：「系統由一組單元或元素組成，它們互有關連，且會以合而為一的方式運作。」換言之，系統理論最重要的含義包括：(1) 各成員間的互動 (interaction)；(2) 每個系統都有其界限，而在系統裏一人的改變會引致其他人的改變 (interrelated or interdependent)。又因為系統是開放的，所以深受環境的影響，包括社會環境以至抽象的價值觀。環境影響人，人也影響環境。不過每個人對同樣的環境也未必有一樣的反應。輔導利用系統的理念，便需從個人、家庭、學校以至社區入手。

一直以來，輔導與教育都以學生個人為介入點。傳統的輔導理論著重個人、自我實現和個人選擇，學校教育重視的也主要是個人的學業成績。此種輔導模式著重線向的關係 (linear causation) ——例如學生成績不好，就是學生懶惰，又如學生行為問題亦歸咎於學生本人的好壞。而系統理念則著重互動的因果關係 (circular causation) ——在校成績退步的原因非常複雜，不能單以學生懶惰作為解釋，亦與在校行為互為影響。筆者試舉以下案例：七歲的案主在升上小一後作出很多引人注意的行為。案主與祖父母、患有精神病的姑媽和二十歲的舅父同住。父親為地盤工人，已失業多年，母親為家庭主婦。半年前同住的祖母去世。父母對案主行為一向態度寬鬆和沒有清楚要求，以為孩子快樂最重要，這可能是由於他們雙方都厭惡孩提時父母對他們嚴厲的管教所致。案主在校說粗口甚至除下褲子，令老師不知所措，同學也感到厭煩。老師對這些不良行為的嚴責和同學的排斥，令案主討厭學校，以至考試時，明知答案也不肯作答。這案例顯示學生的行為問題和成績退步的複雜性，經常牽涉家庭因素：如家庭人數及關係、父母親教育及社經水平、家庭所發生的事故（如家人死亡）、延展家庭的影響、父母受原生家庭的影響等。同時，家庭發生的事也受外圍社會環境所影響（如父親失業）。學

校如果缺乏對這些因素的了解，單以學生未能達到學校系統裏的要求而處罰學生，都會為學生以及家庭與學校兩個系統的成員做成很大的混亂與困擾，亦未必能使學生得到幫助。因此學校系統與家庭系統的互相協調對學生輔導非常重要。

適用於學校的家庭治療的系統理念與技巧

學校同工對於學生在學校學習和行為問題的理論與技巧甚為熟悉，但可能忽略學生的行為和表現所受的家庭影響。本段嘗試就國際文獻，總結一些適用於學校輔導的家庭治療系統與技巧，以供學校輔導專業人員和老師作為參考。這些理論和技巧尤其適合中國文化所強調的家庭成員的角色和崗位，包括對夫婦、子女、兄弟姐妹、公婆媳婦各倫常關係的不同期望與訴求，並且與中國傳統中「長幼有序」、「男主外、女主內」、「嚴父慈母」和「賢妻良母」等價值吻合。以下討論的家庭治療系統理念包括：（1）家庭結構、（2）子系統、（3）界線、（4）父母權威及權力與延展家庭的影響、（5）家庭對壓力的適應、（6）家庭生命歷程，及（7）三角形的聯盟。輔導技巧則包括：（1）交心（joining）、（2）正常化（normalising）、（3）重構想法（reframing）、（4）由同校兄弟姐妹獲取資料，及（5）提問學生每日的生活程序。

家庭治療理念

1. 家庭結構

家庭結構很大程度影響著各家庭成員之間以及與外界的關係。根據家庭社會學的說法，家庭結構可從功能結構主義派和社會建構學派的理論來解釋，前者著重「形」而後者著重「神」。結構主義強調客觀資料的搜集，就家庭人數和成員組合，將家庭分成三大類：三代同堂的延展家庭、以夫婦和子女為主的核心理家庭和因喪偶、分居、離婚、長期住院和入獄導致的單親家庭、再婚家庭等。在香港的情況，卻有需要加入前文所提的「復原家庭主義」，

即家庭模式形貌是核心家庭，但家庭運作和家庭價值是互相支撐的傳統延展。

近代的家庭社會學家，特別是社會建構學派，指出採用結構主義學派的觀點去理解家庭未必足夠解釋家庭的複雜性和多元性。社會建構學派理論深受後現代主義影響，認為人創造歷史同時也受歷史支配。在了解家庭運作方面，這學派認為必須從主觀角度去了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探索家庭，必須從家庭的慣常相處模式或「內涵」入手。例如，過分遷就子女的父母容易造成孩子過分自我，過分依賴的孩子背後通常有過分呵護的父母。畏縮和缺乏自信的孩子背後多是過分權威性的父母；過分縱容的父母往往培養出衝動、自制力低的孩子（Maccohy & Martins, 1983）。另外Nichol（1995）提出三個人際間相處的重要概念：類同的相互作用（symmetrical interaction）、互補性的相互作用（complementary interaction）和影響著家庭成員間相處的「尊卑有分」。類同性的相互作用指兩個性格、作風相近的人的相處和互相影響，例如夫婦同樣性格嚴謹，他們相處時都會實事求是，但缺乏生活情趣。互補性的相互作用是兩個作風、性格和興趣不同的人相處的形態，譬如，開朗大意的太太與嚴謹細心的丈夫能夠互補長短。

「尊卑有分」也相應地影響著家庭成員間的交往。家庭系統內由不同年齡、身分、性別和能力的個體形成，自然在家庭裏衍生權力、決策能力和資源上不同的分配。例如，父母由於年齡、教育程度、身分、能力和資源關係，地位一定會在子女之上。這情形在子女年幼時很明顯。孩子長大了，教育與經濟能力增加了，再加上父母的健康衰退，自我照顧能力下降，父母與子女的地位很多時都會自然地對換了。在今日的香港，中國人的「長幼有序」和「男尊女卑」觀念，仍深深地影響家庭成員間的交往模式。

2. 子系統

家庭是由不同的個體組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因不同輩分、功能、身分和資源而分成不同的子系統，如：夫婦、父母、子女、兒

弟姐妹、祖父母與孫兒。無獨有偶，這與中國人所談的倫常關係十分吻合。這些子系統互相影響，互相聯繫。當中，夫婦是否能夠平等和諧相處，直接影響到子女的適應能力。父母對子女的偏心容易導致兄弟姐妹的不和。傳統的「長幼有序」、「男尊女卑」，在講求平等的現代社會中，容易引起矛盾，在家庭裏更需要融合。在香港，家庭中對男女有不同的期望甚至不平等的對待為數不少（學教團，1997）。祖父母的介入，兩代對養育下一代的不同價值觀，也容易影響父母親與孩子的關係。很多由祖父母帶大的孩子與祖父母的關係反而比父母親近。在離婚或單親家庭中，因為沒有丈夫的支持，妻子很容易依賴子女的情緒支持。有香港特色的菲傭或印傭，產生了除母子之外的特殊關係。傭人與孩子相處時間比父母更長，孩子很多時情緒上依賴傭人比母親更甚，但這些傭人又不能產生父母於孩子的「教導」功能。這種矛盾容易令孩子產生困惑。

界線

子系統之間雖然互相依賴和影響，但必須有自己的界限。例如父母要照顧子女，而子女要孝敬父母。界限有明確的規矩，顯示誰參與某一子系統和如何參與。健康的家庭有清晰的界線。清晰的界線有助家庭的個體獨立，同時也能令家庭成員得到照顧和支持。不過，界線是需要有彈性的。太鬆的界線容易引致家庭成員間互相糾纏（enmeshed），父母凡事為子女張羅，令子女沒有辦法學得獨立。太緊的界線容易引致父母子女間非常疏離（disengaged），子女就是面對問題，也得不到父母的支援。隨著子女的成長，界限需要不斷的重新界定。香港的婦女，很多仍受傳統「賢妻良母」的文化建構影響。「良母」對初小階段的學童照顧無微不至，甚為適切，但當孩子升上高小甚至中學時，如果母親仍以小孩般對待孩子，則孩子不單會覺得母親很囉唆和厭煩，也不能學習獨立。

父母權威及權力與延展家庭的影響

父母權威及權力是指父母在家庭的領導地位（Minuchin, 1974）。

Minuchin認為一個有效的家庭，父母、子女之間需要有強而清晰的界限。祖父母、其他延展家庭成員甚至家庭傭工都可能有相當的領導和決策能力，這情況在單親家庭尤其普遍。適當地分配領導地位，能幫助家庭運作，但當成人的規矩有重要分歧時，可能會令子女無所適從，甚至出現情緒或學業問題。

在單親家庭、雙職家庭或多孩子的家庭中，孩子很多時候會背起過分的領導地位（Anderson, 1999）。若孩子的權威有明確的界限，孩子很多時能學曉處理家務和看顧弟妹。但孩子若負上太多的成人責任，便會成為「代理父母」（parentified）（Minuchin, 1974），同時，他們作為兒童的需要卻未能得到滿足（Elkind, 1988）。學校輔導員可幫助父母決定適合孩子的責任，不致令孩子過分負荷。

家庭對壓力的適應

家庭的壓力，一方面可以來自發展性的事件，如生、死，以及孩子的成長和疾病。一個新孩子的誕生，需要家庭其他成員有相應的改變。父母要適當地回應子女因妒忌而突然對父母過分要求注意。輔導員可教導父母給予孩童適當的關懷時間，而非不適當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壓力可以來自家庭以外的影響：如搬家和工作改變（Goldenberg & Goldenberg, 2000）。香港最近很多家庭所經歷的失業、負資產和去年的SARS，都帶來很大的壓力。社會災難與暴力（Ursano & Fullerton, 1990）能令家庭產生壓力，特別當家中有人因而死亡，情況就會更惡劣。

家庭生命歷程

家庭如個人一樣，有著它的生命歷程。Duvall（1977）將家庭生命歷程分為八大階段，包括新婚、家有幼兒和與小學生有直接關係的學齡階段。一個健康的家庭會因應家庭生命歷程中不同階段的需要，在成員的角色扮演、溝通動態和權力分配等有所改變，以配合身處不同階段的各家庭成員的需要。在學齡階段的孩童，需要學習離開父母，接納除父母以外的成人的關愛，與同學分享老師的關愛，

與同學交友。在這階段，父母最重要的職責是提供孩童經濟和生活的安排，愛護和教養孩童，在家庭方面維繫夫婦親愛的關係和保持與祖父母及親戚適切的關係。此階段容易產生的困難是學童在校的學習或行為問題及被忽略的夫婦關係。Carter & McGoldrick (1980, 1988) 更提出離婚與再婚在今日社會也變得普遍，不幸發生的時候，也有它們一定的歷程。離婚時所需要處理的，包括：決定離婚、計畫分開、分居和兒女安排。離婚後同住與非同住父母都有他們各人所要面對的事情，如處理經濟和重建個人的支援網絡。離婚雙方必須共同商議，使孩子繼續享有經濟支援和良好的親子關係，非同住父母更需要保持探望子女。再婚需處理的任務，包括：進入新的關係、構思新的婚姻與家庭、再婚與家庭重組。當中要務是要放棄「完整家庭」的理想，並接納新的家庭模式。這個新家庭模式需要一個新的、能滲透的界限，以期一方面能容納新的伴侶或後父母，而另一方面能與原父母（非同住）保持關係。家庭成員要學習接納與處理由新家庭建立所衍生的複雜情緒和多元角色。有關離婚的文獻與臨床經驗顯示（Dowling & Barnes, 2000, p. 179），離婚的學童在以下的情況會更能處理父母的離婚：

- 家長沒有持續的糾紛
- 學童能容易及自由地接觸父母
- 父母向學童就家庭解體有一全面的解釋
- 與非同住父母有穩定和可預測的探望安排
- 在核心家庭外，有穩定的支援系統
- 關懷和接納的學校環境：學校對學生的需要和其家庭狀況有敏銳的感覺

三角形的聯盟

Bowen (1978)、Minuchin (1974) 和其他家庭治療師（見 Goldenberg & Goldenberg, 2000）推出三角形的理念。Bowen用三角形來形容三個人之間的關係。他發現兩個人的系統基本上是不穩定的。當兩個人的關係緊張時，第三個人很多時會被捲入三角形中。例如，

當父母間有衝突時，孩子容易被牽連與父或母作出聯盟，成為第三者，並感到很為難。在家庭中，某孩子會因自己的排行次序、性格、行為和其他特質被選擇成三角形的第三隻角。處於這種狀況的孩子，很多時都會出現學業或行為上的問題。若遇到這情況，學校除了用方法輔導學生外，亦應將父母轉介婚姻輔導或將整個家庭轉介家庭治療。中國傳統中「嚴父慈母」的親子模式容易令母親與子女形成聯盟，令父親成為三角的第三隻角。

家庭治療技巧

1. 交心(joining)

交心指輔導員或教師與孩子及其家人，建立融和關係的一些技巧（Baker, 1996）。與家長細談和討論他們以往與學校的接觸都是常用的方法。輔導員可以仿效家人的情緒表現模式，以增加家人的認同。例如：若父母的坐姿是放鬆的，輔導員可用比較輕鬆和隨便的態度以使他們覺得舒服。輔導員也可以用「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與家人建立關係。若多過一位家人會見輔導員，輔導員必須關注每一位，並給他們說話的機會。若與仍然處於「男尊女卑」傳統的家庭面談，首先與爸爸傾談，可能會更適合家庭本身的文化，從而更容易與該家庭建立關係。對於一般中國家長重視學業和望子成龍的心態，輔導學生時以學生的成績和才能為入手點，會很容易取得家長的認同而達到交心的作用。

2. 正常化(normalising)和重構看法(reframing)

正常化指幫助父母看到他們子女的行為、態度和感受是正常的（Dinkmeyer, Dinkmeyer, & Sperry, 1987）。例如某家長對老師或輔導員表示孩子沒有學習動機或不願意主動做功課，老師或輔導員可指出這情況在這年齡的孩子相當普遍，而且很多家長都面對同樣的問題。這樣可使父母覺得他們在這問題上並不孤單，或者自己不是無能的父母。另一方面亦可使父母覺得他們的孩子本身並不是問題兒童，

從而使他們增加信心，感到當前面對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這技巧對於中國文化著重固本培元（霍玉蓮，2004）、選擇逃避問題（石丹理，1999c）和未必願意接受西方的心理輔導等特色尤為適用。

重構看法是將負面的看法、情況、問題加上正面的成分或從另一觀點看，藉此試圖改變家庭對問題的看法，找出新的角度或選擇，以期最終改變家庭行為的問題（Goldenberg & Goldenberg, 2000, p.14）。例如輔導員可以幫助家長看到駁嘴和不聽話的少年有自己獨立的想法，是長大和思想開始成熟的表現。輔導員或老師可以反問以下的問題：「你的孩子告訴你他/她已開始長大，你認為有甚麼地方他/她可多表達自己的看法或多作決定？」

家長通常很難啟齒說出自己孩子的問題，認為這樣會展示自己作為家長的不足。正常化和重構看法在輔導初期不獨能減低家長的恐懼，減少他們對學生的埋怨，更可將焦點集中於如何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3. 由同校兄弟姐妹獲取資料

兄弟姐妹關係在家庭系統裏很重要。兄弟姐妹子系統能提供家庭運作的寶貴資料（McGoldrick, Watson, & Benton, 1999）。若輔導員或老師不易由家長獲取訊息，從同校的兄弟姐妹很容易找出所需的資訊。在香港一般兄弟姐妹都讀同一學校的情況下，這技巧相當可行。譬如學生在學校沉默寡言，可以從兄弟姐妹找出他/她在家的否也一樣。當學生也向輔導員提及與兄弟姐妹在家的糾紛，輔導員或老師更可以直接介入，幫助調解，以緩和學生的家庭氣氛。

4. 提問學生每日的生活程序

家長對於子女在家的日常生活狀況最明瞭。輔導員與老師可從每日程序問題，如誰叫醒學生、叫多少次、她/他如何吃早餐、穿衣服、如何上學與返家、如何做功課及進行課餘活動，獲取有關資訊，如家人對孩子的期望、管教、鼓勵和障礙、家庭活動、家人如何作決定、解決問題和培養孩童責任感。假如與家長面談時，發覺八歲

的孩子仍要父母或傭人幫助梳洗和穿衣上學，就知道父母為子女做得太多，難令學童自己負上預備上學的責任。又如孩子在放學後，直至晚上都是由母親督導做功課，就難怪孩子缺乏主動學習和厭倦讀書，因為孩子沒有機會玩耍和為自己的學習負責。提問過程中，當父母指出一些開心和有效的家庭生活模式，輔導員或老師可鼓勵家長繼續用這些有效的方法。相反地，提問學生每日的生活程序，很多時也能幫助父母找出一些無效的家庭交往方法，從而建議和商討適當的改進策略。此種具體但非直接的方法，十分適合中國人的文化特色。

結語

本文首先強調家庭影響學生的學習與成長，然後概覽影響香港家庭的一些本港及全球因素，指出要明白學生，必須明白其家庭及影響其家庭的因素。文中提出一些家庭治療的理念和技巧，希望能在明白學生及諮詢家長方面有所幫助。明白到學生是直接受家庭和社會處境所影響，可以幫助學校人員體諒學生和對他們的需要更為敏感。了解家庭系統的複雜性和互為因果，能更有效地輔導學生和直接提供家庭生活教育的素材。而運用家庭治療的技巧更能幫助家校的溝通和合作。Dowling & Barnes (2000) 認為在家庭環境面臨轉變的時候，學校需要提供支援，因為學校與家庭在學生的心目中，二而為一。在一環境發生的事直接影響在另一環境的情況。況且，學校若只注重智育和學生的成績，不知道學生的學習其實很受情緒因素影響，而忽略學生因家庭系統所引發的情緒問題，則很難幫助學生突破難關。於此，可見系統理念在小學輔導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 《文匯報》(2004, 5月15日)。〈離婚率升·暴力案增·家庭團結指數劇跌·社聯倡社會反思·加強對新來港家庭支援〉。《文匯報》香港新聞A21版。
- 石丹理(1999)。《兩代相衝與相融——家庭價值觀異同的啟示研究報告》。香港：小童群益會。
- 石丹理、陳麗君(1998)。〈家庭因素與青少年心病徵、應付資源、學校行為及藥物濫用的關係〉。《青年研究學報》，第1卷第1期，頁113-126。
- 《明報》(2000, 10月15日)。〈三成半家長認不懂教子·親子最大戰場：學業成績〉。《明報》港聞A7版。
- 《明報》(2002, 1月21日)。〈六成中學生夜歸·一成玩通宵〉。《明報》港聞A6版。
- 《東方日報》(2004, 5月15日)。〈家庭團結指數倒退逾倍〉。《東方日報》港聞A29版。
- 香港小童群益會(1990)。《香港父親在家事上的參與》。香港：作者。
- 香港小童群益會(2003)。《穗港兩地父親生活壓力狀況研究報告》。香港：作者。
- 香港政府統計署(2002a)。《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主要報告——第一冊》。香港：政府印務局。
- 香港政府統計署(2002b)。《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女性及男性》。香港：政府印務局。
- 馬和民(1990)。〈家庭環境與學業成績〉。《教育研究》，第2期，頁77-80。
- 馬麗莊(2001)。《青少年與家庭治療》。台北：五南圖書。
- 《都市日報》(2003, 8月26日)。〈20萬家庭月入不足4千·6年升1倍〉。《都市日報》港聞P01版。
- 霍玉蓮(2004)。《婚姻與家庭治療：理論與實務藍圖》。香港：突破出版社。
- 羅秉祥(1993)。《繁星與道德》。香港：三聯書店。
- 學教團(1997)。《初中學生適應問題探討》。香港：教育圖書。
- Anderson, C. M. (1999). Single-parent families: Strengths, vulnerabilities, and interventions. In B. Carter & M. McGoldrick (Eds.), *The expanded family life*

- cycle: Individual, family,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3rd ed., pp. 399–416). Boston: Allyn & Bacon.
- Baker, F. (1969). Review of general systems concepts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medical care. *Systematics*, 7(3), 209–229.
- Baker, S. B. (1996). *School counsel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Merrill.
- Bertalanffy, L. von. (1956). General systems theory. *General systems yearbook*, 1, 1–10.
- Bowen, M. (1978).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 Carter, E. A., & McGoldrick, M. (Eds.). (1980). *The family life cycle: A framework for family therapy*. New York: Gardner Press.
- Carter, E. A., & McGoldrick, M. (1988). Overview: The changing family life cycle: A framework for family therapy. In E. A. Carter & M. McGoldrick (Eds.), *The changing family life cycle: A framework for family therapy* (2nd ed., pp. 3–28). New York: Gardner Press.
- Dinkmeyer, D., Dinkmeyer, D., Jr., & Sperry, L. (1987). *Adleria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2nd ed.). Columbus, OH: Merrill.
- Dombusch, S., Ritter, P., Leiderman, H., Roberts, D., & Fraleigh, M. (1987). The relation of parenting style to adolescent school performance. *Child Development*, 58, 1244–1257.
- Dowling, E., & Barnes, G. G. (2000). *Working with children and parents through separation and divorce: The changing lives of children*. London: Macmillan.
- Duvall, E. M. (1977). *Marriage and family development* (5th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 Elkind, D. (1988). *The hurried child: Growing up too fast too so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Forehand, R., Long, N., Brody, H., & Fauber, R. (1986). Home predictors of young adolescents' school behavior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Child Development*, 57, 1528–1533.
- Giddens, A. (2001). The global revolution in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In A. S. Skolnick & J. H. Skolnick (Eds.), *Family in transition* (11th ed., pp. 17–23). Boston: Allyn & Bacon.
- Goldenberg, I., & Goldenberg, H. (2000). *Family therapy: An overview* (5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 Good, T. L., & Brophy, J. E. (1986). School effects. In M. C. Wittrock (Ed.), *The*

-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3rd ed., pp. 570–604). New York: Macmillan.
- Haley, J. (1987). *Problem-solving therapy* (2nd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Lau, K. L. (1995). *Family relationship, self-concept, and delinquency among Hong Kong adolescent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w, C. K., Chan, L. W., Young, K., Ko-Lau, P. C., Wong, Y. C., Mehrani, T., Cheng, K. C., & Li, W. L. (1995). *Contemporary Hong Kong familie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Women Foundation;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ee, M. K. (2000, November). *Hong Kong's family trends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Family Trends and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Issues and Lessons", Hong Kong.
- Luk-Fong, Y. Y. P. (2005). A search for new ways in describ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Voices from principals, teachers, guidance professionals, parents and pupils. *Childhood, 12*(1), 111–137.
- Maccoby, E. E., & Martins, J. A.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E. Hetheringto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1* (pp. 1–101). New York: Wiley.
- McGoldrick, M., Watson, M., & Benton, W. (1999). Siblings through the life cycle. In B. Carter & M. McGoldrick (Eds.), *The expanded family life cycle: Individual, family,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3rd ed., pp. 153–168). Boston: Allyn & Bacon.
- Minuchin, S. (1974).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Nichol, M. (1995). *The family therapy concepts and methods* (3rd ed.). New York: Allyn & Bacon.
- Nicoll, W. G. (1984).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the functional family: Implications for treatment goals and outcome research.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45*, 1694A.
- Olson, C. C. (1984, April). *Effects of parenting and home environment on student achievement in grades 3 to 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A.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247 002)
- Portes, P., Franke, S., & Alsop, R. (1984).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processes related to scholastic achievement in urban elementary children. Louisville, KY: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Counseling.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253 626)

- Rutter, M. (1985). Family and school influences 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6, 683–704.
- Schiamberg, L., & Chin, C. (1987, April).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n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of adolescents in rural low-income areas: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Baltimore, MD.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03 253)
- Shek, D. T. L. (1999a).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a Chinese context.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5(1), 27–44.
- Shek, D. T. L. (1999b). Paternal and maternal influences o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hinese adolescents.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5(3), 269–296.
- Shek, D. T. L. (2000). Parental marital quality and well-being: Parent-child relational quality, and Chinese adolescent adjus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8, 147–62.
- Shek, D. T. L. (2002).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hool adjustment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3, 497–502.
- Steinberg, L., & Elmen, J. (1986). Adolescent responsibility, parent-child relations, and school performance. Madison, WI: National Center on Effective Secondary School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03 253)
- Ursano, R. J., & Fullerton, C. S. (1990).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response to trauma. *Journal of Applied School Psychology*, 21, 1766–1775.
- Zill, N. (1996). Family change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What we have learned, what it means for schools. In A. Booth & J. F. Dunn (Eds.), *Family-school links: How do they affect educational outcom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Family and Primary School Counseling From a Systemic Perspective

Pattie Luk

Abstract

Based upon the system approach of "person in contex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counseling in primary schools. The influences of the school system, the family system, the loc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s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re first discusse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s then proposed. Basic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of family therapy, as well as their applications in school counseling, are also introduced for the reference of school counseling personnel and teacher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emphasizing that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counseling services in primary schools, the family system and the school system must be well-coordinated.